

世界大战丛书
第二辑

Winston Churchill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02

THE [REDACTED] WAR

晦暗不明的战争

〔英国〕温斯顿·丘吉尔 著

吴泽炎 万良炯 沈大靖 译 张自谋 校译

Winston Churchill



THE TWILIGHT WAR 晦暗不明的战争

〔英国〕温斯顿·丘吉尔 著

吴泽炎 万良炯 沈大靖 译 张自谋 校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晦暗不明的战争 / (英) 丘吉尔 (Churchill, W. L. S.) 著,
吴泽炎, 万良炯, 沈大靖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9
(世界大战丛书)
ISBN 978-7-5447-2817-1

I. ①晦… II. ①丘… ②吴… ③万… ④沈… III. ①第二次世界
大战—史料②丘吉尔, W.L.S. (1874~1965)—回忆录
IV. ①K152 ②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8810号

书 名 晦暗不明的战争
作 者 [英国] 温斯顿·丘吉尔
译 者 吴泽炎 万良炯 沈大靖
校 译 张自谋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胡慧华
原文出版 Cassell, 194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59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817-1
定 价 38.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6) by WINSTON S. CHURCHILL
Copyright: © The Gathering Storm © 1948 by WINSTON S. CHURCHILL;
Their Finest Hour ©1949 by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1950 by WINSTON S.CHURCHILL;
The Hinge of Fate ©1950 by WINSTON S.CHURCHILL;
Closing the Ring ©1951 by WINSTON S.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 ©1953 by WINSTON S.CHURCHI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Beijing Pengfeiyili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247号

本书的铭言

战争时：坚决刚毅

失败时：顽强不屈

胜利时：宽容敦厚

和平时：友好亲善

致 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在军事方面得到亨利·波纳尔爵士中将很大的帮助，在海军问题上得到艾伦准将的帮助，在欧洲和一般问题上得到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迪金上校的帮助，他在我写作《马尔巴罗传》一书时也给了我帮助。爱德华·马什爵士在措辞用字方面帮了我很大的忙。对于其他审阅过原稿并提出意见的许多人士，我也表示谢意。

伊斯梅勋爵也曾给我很珍贵的帮助，他以及我的其他一些朋友还将在以后继续给我帮助。

承蒙英王陛下政府准予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本文，此类文件的王家版权法定属于英王陛下政府文书局局长所有，特此致谢。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序 言

我曾在《世界危机》、《东战线》和《战后》三书中记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情；我必须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各卷乃为承前之作。如果本书全部完成，与以上各书合起来，将成为又一次“三十年战争”的记载。

同前面各书一样，我尽力之所及，仿效了笛福的《一个骑士的回忆录》的撰述方法，在那本书中，作者以一个人的个人经历为线索，记述和议论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事件。我也许是唯一的身居政府高位并经历了有历史记载以来两次最大劫难的人。不过在第一次大战中，我担任的还是次要的职位，而在第二次对德战争中，有五年多我是英王陛下政府的首脑。因此这本书是我以不同的立场和非以前各书所能有的更大的权威来写的。

我的全部公务工作几乎都是我口授秘书办理的。在我任首相的时期内，我发布的备忘录、训令、私人电报和节略，总数几达一百万字。那时每天都得处理许多重要的事情，而所根据的又是当时所能得到的资料，因此，当时逐日逐日写出来的这些文件自然难免有许多缺点。但综合在一起，这就是由一个在不列颠帝国和联邦的战争和政策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在当时所看到的那些重大事件的真实记载。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或过去曾否有过这种关于战争和政府工作的逐日记录。我并不把它称为历史，因为编写历史是属于后代人的事，但我有信心地宣称，它是对历史的一个贡献，将对后世有所裨益。

这三十年来的行动和主张，包含和表现了我的毕生努力，我愿人

们据此而对我作出评断。我恪守我的一个原则：对于在战争或政策上的任何措施，除非事前我曾公开或正式发表过意见，或提出过警告，我决不做事后的批评。实际上，我在事后的回顾中，已将当时争论中的许多严峻之词改得温和些了。我记述了那么多我所爱戴和尊敬的人同我的分歧，使我十分难过，但是，如果不把过去的教训提出于未来之前，那就不对了。本书记下了那些诚实而善良的人的行为，但愿不至于有人因此而轻视他们，却不去扪心自问，不检讨自己履行公职的情形，不吸取过去的教训作为他自己的未来行为的借鉴。

不要认为我希望人人都同意我所说的一切，更不要认为我只写些迎合公众的东西。我是依照我所持的见解提出论证的。我已竭尽所能极其谨慎地核实材料，但是由于缴获敌方文件而有所披露，或有其他新的发现，不断有许多史实公布于世，这就有可能对我所下的结论提供新的东西。在全部情况尚未明了之前，应以当时的确实可靠的记录和用文字写下的意见作为根据。这样做之所以是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告诉我，他正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称。我立即说：“不需要的战争。”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上次大战给世界以重大的破坏，剩下来的东西，在这次大战中又给毁光了。现在，在亿万人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并取得了正义事业的胜利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和平或安全，现在我们又处在比我们曾终于克服了的那些危险更为严重的危险之中，这可以说是人类悲剧中的高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殷切地希望，新一代能够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从而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光荣，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于肯特郡，韦斯特汉，
恰特韦尔庄园

1948年3月

为新版写几句

趁这次重印的机会，我有可能改正一些细节上的错误。我感谢那些曾注意到这些错误并提出修改意见的人。同时我必须表示，我十分珍视本书所受到的普遍欢迎。许多人曾给我写信谈及本书，我谨对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这次出新版，使出版社得以用较大的字体重新排版，希望这一变动会使所有的读者感到满意。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于恰特韦尔庄园

1949年6月14日

英国世界的人民如何由于他们的不明智、
麻痹大意和好心肠听任恶人重新武装。

目 录

第一章 战争	1
第二章 海军部的重大任务	18
第三章 波兰的覆灭	39
第四章 战时内阁的问题	49
第五章 法国前线	69
第六章 战斗加剧	83
第七章 磁性水雷	98
第八章 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	111
第九章 斯堪的纳维亚 芬兰	132
第十章 一个黑暗的新年	150
第十一章 风暴之前	170
第十二章 海上的交锋	188
第十三章 纳尔维克	207
第十四章 特隆赫姆	221
第十五章 在挪威的挫折	237
第十六章 挪威：最后的阶段	253
第十七章 政府倒台	261
附 录	270

第一章 战争

361

张伯伦先生邀请我入阁——9月2日的犹豫——9月3日的宣战——第一次空袭警报——重新主管海军部——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我关于海军事务的知识——1914年和1939年的对照——海军的战略形势——波罗的海——基尔运河——意大利的态度——我们地中海的战略——潜艇的威胁——空袭的威胁——日本的态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战时内阁的组织——张伯伦先生的最初选择——一个老前辈的人物——午睡的妙用

9月1日黎明，德国进攻波兰。同一天早晨，我们的所有部队奉命动员。首相请我在下午到唐宁街去见他。他告诉我，他认为避免与德国作战的希望已经幻灭，提议成立一个由少数不负责专部的阁员组成的战时内阁来指挥作战。他提到，据他了解，工党不愿参加联合政府，但他仍然希望自由党将会参加。他邀请我担任战时内阁的阁员。我未加任何评论，便接受了他的提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于人选和措施，进行了长谈。

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觉得组成指挥作战的最高执行机构的阁员，他们的平均年龄必然会使人感到太高了。为此，我在午夜以后写信给张伯伦先生：

1939年9月2日

我们岂不是成了一个老人队了吗？我发觉你昨天向我提起的六个人的年龄总数，竟达三百八十六岁，也就是平均六十四岁以上！仅比领取养老金规定的年龄差一岁！不过，如果你把辛克莱（四十九岁）和艾登（四十二岁）延揽入阁，平均年龄就可以降到五十七岁半。

362 如果《每日先驱报》关于工党不拟参加政府的说法是真实的，我们今后一定会遇到经常不断的批评，以及战争中往往出现的令人沮丧和出人意料的事件。因此，在我看来，更加重要的是，邀请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自由党坚决地参加我们的队伍。艾登对于支持他的那部分保守党人，以及温和的自由党分子，都有相当的影响。在我看来，利用这种影响也是增加实力的一个极其必要的办法。

波兰人遭受猛烈的进攻，现在已有三十小时了。我听到巴黎方面还有再提照会的说法，深为不安。我相信你最迟在今天下午议会举行会议时，就能够提出联合宣战的声明。

除非海军部采取特别的措施，并在今天发出信号，否则，德国军舰“不来梅”号即将驶出阻截区。这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但也很可能引起麻烦。

我在此听候你的指示。^[1]

9月2日是非常紧张的一天，但我很奇怪，整整一天没有听到张伯伦先生的动静。我想他也许为了保持和平而正在作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事实证明确实如此。然而，到了会议开会时，却发生了一场短暂的、但很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首相模棱两可的声明，引起了整个下院的不满。当格林伍德先生起立，代表工党反对党发言时，保守党席上的艾默里先生向他高声喊道：“要为英国说话。”这句话博得了大声喝彩。下院的情绪无疑是主张作战的。我甚至认为比我曾亲自参加的1914年8月2日的同样场面，更显得坚决和团结。那天晚上，各党派的一些

重要人士，都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对面我的寓所来拜访我，表示深切的忧虑，唯恐不能履行我们对波兰的义务。下院准备在第二天下午重新开会，当天晚上，我写给首相一封信如下：

1939年9月2日

在星期五我们的谈话中，据我了解，我将成为你的僚属，而且你对我说，这个消息很快就要宣布。但从那时起，我一直没有听到你的任何下文。我真不知道，在这紧张骚动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虽然，在我看来，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你对我说“大局已经决定”时所表示的思想已经截然不同了。我非常理解，为了应付这种非常重要的欧洲局势，方法的变换也许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你在中午辩论开始以前，让我知道不论为公还是为私，我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

363

在我看来，如果工党态度疏远，而且据我所知，自由党也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在这样狭隘的基础上，很难组成一个你所提到的有效的战时政府。我认为我们应当进一步努力，以争取自由党参加，而且对于你曾和我讨论过的战时内阁的组织与范围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今天晚上议会里有一种观感，即认为我们决心的明显削弱，已经使全国团结一致的精神受到了损害。我并不低估你应付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但是我深信我们现在将要自作决定，从而给我们的法国朋友作出任何必要的榜样。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需要尽可能地组成最强大、最完整的联合政府。因此，我请你在我们再进行一次谈话以前，不要宣布战时内阁成员的名单。

正如我昨天早晨写给你的信中所说，我完全听候驱使，并衷心希望帮助你完成艰巨的任务。

后来我了解，英国的最后通牒已在9月1日下午九时三十分递交德国，接着在9月3日上午九时，又递交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最

后通牒。9月3日早晨的广播，宣布首相将在十一时十五分发表广播演说。因为这时看来，英国和法国肯定会立刻宣战，我便准备了一篇简短的演说。我认为这篇演说对于我们一生中以及历史上的这个庄严伟大的时刻来说，是很得体的。

首相的广播演说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处在战争状态。他的话刚说完，我们耳边突然听到了一阵陌生的、持久的、凄厉的声响，这种声响后来就变得习以为常了。我的妻子跑进房来，由于当时的形势危急而显得神情紧张，但她对于德国人敏捷而又准确的行动，却给予好评。我们俩一同登上寓所的屋顶，看一看外面发生的情况。在我们周围，在晴朗凉爽的9月的阳光下，四面八方的伦敦的屋顶和尖塔，历历在望。在这些屋顶和尖塔上面，已经有三十或四十个圆柱形的气球冉冉上升。我们对于政府这种显然有所准备的迹象，表示满意。我们预料应该有一刻钟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将要结束时，我们便带了一瓶白兰地酒和其他适用的药品，配备齐全地走到指定给我们的防空洞去。

我们的掩护所，就在顺着大街走过去约有一百码的地方，其实只是一个敞开的地下室，外边甚至还没有堆起沙袋。附近六家的居民早已聚集在室内。每个人都抱着高兴而又诙谐的态度。这是英国人面临凶吉未卜的前途时所表现的民族本色。当我站在门口凝视着空寂的街道和下面拥挤的地下室时，在我的想象中呈现出了这种景象：毁灭与屠杀的场面；震撼地面的巨大爆炸声；高楼大厦转瞬间坍塌成为瓦砾土堆；消防队和救护车在隆隆的敌机声下，在浓烟中穿梭往来。我们不是早已听说空袭将是如何的可怕吗？空军部当然为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而大大地夸张了空袭的威力。和平主义者曾经设法利用公众的这种恐惧心理，而我们这些人一向督促政府积极准备，建立一支优势的空军，虽然不承认那种最可怕的预测，但也赞成将它作为对当局的一个刺激。我知道政府在战事初起的几天内，曾预备了两万五千张病床，以供空袭中受伤者应用。至少在这方面，没有发生估计过低的情况。现在应该看一看实际发生的情形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以后，凄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我自己不敢断定这次是否是重复一次警报，但有一个人一路奔来，高声喊道：“警报解除了！”我们于是就分散，各自回家去做我们的工作。我自己便到下院去。下院在中午按时开会，不慌不忙地按照议事程序进行，并做了简短而庄严的祈祷。在议会里，我接到首相的一封便函，要我在辩论结束后，立即到他的房间去。经过最近几天极度兴奋而又激动的心情，当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倾听议员们演说时，一种特别强烈的宁静感紧紧地攫住了我。我觉得内心安详，并体会到一种凌驾于人间事务与个人问题之上的超然感。英国虽然爱好和平和缺乏准备，但在国家荣誉的召唤下，瞬间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旧时英国的这种光荣传统，使我整个身心异常激动，而且似乎把我们的命运，提升到一个远离尘世现实和肉体感受的境界。发言时，我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心情转达给下院，结果得到了良好的反应。

张伯伦先生告诉我，他已经考虑了我的信；他说自由党拒绝参加政府；他准备让负有行政职务的海陆空三个部的大臣参加战时内阁，从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关于平均年龄的见解，并且可以将平均年龄减低到六十岁以下。他说，这样就可以使他邀请我担任海军大臣，并在战时内阁中担任阁员。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虽然我从来没有提出这点，但我当然愿意主管确定的任务，而不愿高高在上，出谋划策，督促别人工作。一个部长，不论势力多大，如果不主管专部，结果往往如此，颁发训令要比提出建议容易，而有权采取行动，即便范围有限，也比有权参加泛泛的讨论更为适宜。如果一开始首相就要我在参加战时内阁与主管海军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我当然一定会选择海军部。而现在我却二者兼有了。

365

关于我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正式由国王授职，张伯伦先生只字未提。实际上，直到5日我才就职。但战争初起的这段时间，对于海军也许有生死存亡的关系，因此我通知海军部，告诉他们我立即就任，准备在六时到部视事。海军部接到通知，立即好意地向舰队发出信号：

“温斯顿回来了。”这样我就重新回到了几乎恰好二十五年前我在痛苦和遗憾中离开的那间办公室；二十五年前由于费希尔勋爵的辞职，我被解除了海军大臣的职务，并且事实证明关于在达达尼尔海峡强行登陆的重要计划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2]我坐在以前的那张旧椅子上，在我背后几英尺的地方，是我在1911年所安置的一个木制的地图箱，箱内仍存有北海的地图，当时为了便于集中关注最重要的目标起见，我曾命令海军情报局，每天在地图上注明德国公海舰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自从1911年以来，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已经消逝了，然而，我们却仍然面临着在同一个德国的魔掌下遭受荼毒的威胁。我们再一次为了捍卫一个无辜遭受侵略和蹂躏的弱国的权利，而奋起作战。我们再一次为了生存和荣誉，奋起反抗日耳曼这个勇敢的、有纪律的却又残酷的民族的一切疯狂暴力。我们需要再一次战斗！既然如此，就战斗吧！

* * *

366 不久，第一海务大臣来看我。我在以前担任海军大臣期间，就与达德利·庞德相识，但不很熟，只知道他是费希尔勋爵的亲信参谋军官之一。以前在意大利进攻阿尔巴尼亚时，他曾任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当时我在议会中对于地中海舰队的部署，做过激烈的抨击。现在我们以同僚的身份相见，而庞大的海军部整个机构是否能够顺利运行，这就要依靠我们能否保持亲密关系和取得基本一致的见解了。我们彼此用一种怀疑的、但却友好的眼光看待对方。但从最初的时候开始，我们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便逐渐增长和成熟起来。我对庞德海军上将在业务上的专长和个人的伟大品质，给予适当的评价并加以尊重。在变幻无常、胜负莫测的战争中，我们一同受过巨大的冲击，因此我们成为更加忠实的同志和朋友了。四年以后，正当对意大利的战争获得全面胜利时，他竟与世长辞，我以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海军和全国所